

张季鸾与《大公报》

王润泽◎著

上海滩的立足 汉口阵地的艰守

重庆时代

张季鸾、《大公报》与民国社会

[illegible]

報人時代

张季鸾与《大公报》

王润泽◎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季鸾与《大公报》/王润泽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8

(报人时代)

ISBN 978 - 7 - 101 - 05711 - 9

I. 张… II. 王… III. ①张季鸾一生平事迹②大公报—史料 IV. K825.42 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8854 号

书 名 张季鸾与《大公报》

著 者 王润泽

丛 书 名 报人时代

责任编辑 刘树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4¼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711 - 9

定 价 26.00 元

引言：民国十五年(1926)

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年，对于张季鸾来说，也是他人生的转折之年，是他人生和新闻从业经历迈向顶峰的开始；这一年对于中国的新闻业来说，也是于逆境中走向独立、成熟的开始，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肇始之年。

军事政治环境：风云际会、五味杂陈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丙寅(虎)年。

该年中国大陆虽名义上统一，有代表中央的北洋军阀政府，但实际上该政府在袁世凯死后，就处于分崩离析的混乱之中，各派军阀割据和混战已达十年之久，此刻也到了决战的关键时期。交战的主要双方是南方国民党控制的广东革命政府和北方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这是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矛盾的主要方面。南方国民党虽与共产党处于合作阶段，但分共、反共势力活跃，同时内部也并不团结；而北洋军阀内部的其他大小军阀并没有和北京政府保持一致，他们或支持一方、或持观望态度，希望在关键时刻得渔翁之利，这种矛盾形成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次要方面。

要理清当时中国纷乱的政治局面，还要从北洋军阀的起源和内部派别说起。

北洋军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清政府摹仿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编练新式陆军，以维持其统治开始。到清王朝覆灭时，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组建成六个镇完整的新军，被称为北洋陆军。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其创建人。辛亥革命时期，他依靠这支武装，一方面和革命军谈判和平，一方面逼迫清帝逊位，并为自己谋得“大总统”职位，继而当上“皇帝”。袁死后，该军中的军官（已被称为北洋军阀）逐渐分裂成以直隶人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冯死后，首领为曹琨和吴佩孚），以安徽人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此外，以奉天人张作霖为首的一派被称作奉系。最初当政的皖系段祺瑞听信其亲信徐树铮的意见，希望借武力统一中国，但1920年与直系一战被打得大败，段被迫下台；而上台的直系同样迷信武力统一中国，于是军阀间不断混战。直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皖系的残余势力几乎被消灭，直系又分裂为吴佩孚、孙传芳和国民军三派，加上奉系，形成四大对峙势力。在北伐前夕，这四派势力各自在外国靠山的支持下，进行着复杂多端、变化无常的争斗。

北方军阀中也有倾向革命的成分。从直系分裂出来的国民军共有三支，冯玉祥部为第一军的主力，素以会练兵善征战闻名，其野心和能力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猜忌，受到压制；第二军和第三军的首领本身就是国民党人。这三支不满直系现状的实力派，组成国民联军，和奉系军阀联合，在前线倒戈反直，推翻曹、吴势力在中央的统治，国、奉两系成为中国北方的实力派。但这两派也为争夺地盘而暗斗，同时奉系在南方扩张地盘时又遇直系残余势力联合反攻。奉系南北受敌，正在此时，郭松龄内部倒戈，与国民军合作，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本来奉系已无路可走，张作霖也认为大势已去，准备退出山海关外。但因为日本人拉拢郭松龄不成，转而全力支持张作霖，使张起死回生。郭军在接连

的胜利之际，突然一败涂地，这是1925年12月底的事情。

就在奉系接近崩溃时，国民军在北方已有相当势力，天津也在国民军的控制之下，如果广东革命政府能及时北伐策应，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历史也许会提前进入新的时期。但当时国民党右派以“护党”名义搞分裂，积极反共。在国民党实力派蒋介石的心中，肃清共产党比北伐可能更重要些。

良机错失的国民党很快就发现时局已急转直下。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下，原来敌对的直、奉两派，已化敌为友，迅速向国民军反扑过来。1926年1月，冯玉祥通电辞职，宣布取消国民军名义，自己到欧洲游历去了。北方局势基本上又为直系控制，只是天津还有国民军在奋力抵抗。天津局势使直、奉背后的支持者日本深感忧虑，直接派兵炮轰大沽口，受到国民军坚决迎击，日本反向段祺瑞政府施压，要求解除国民军武装。

这一行径激起北京人民的义愤，3月18日，在料峭的寒风中，抗议人群召开“国民大会”，并游行示威。当示威群众聚集在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残暴的军警竟然开枪射击，造成四十七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史称“三一八惨案”。虽然有证据证明当时开枪的命令并不是段祺瑞本人所下，而且他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传说他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但惨案引发了社会各界反政府浪潮，巨大的舆论



“三一八”惨案发生地纪念碑

压力直接导致了他的倒台。

4月9日，国民军赶走了段祺瑞，段氏在中国的历史也就此完结。与此同时，国民军企图利用直、奉之间的矛盾分化之，但没有成功，在奉军等的攻击下，国民军于4月15日退集南口作长期固守之计了。

1926年成了段祺瑞这个被誉为“三造共和”的人物结束其政治生涯的年头，也是北洋军阀统治走向崩溃的开始，而中国也因为1926年开始的北伐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1926年6月5日，南方革命军宣布北伐，决定武力统一中国，结束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

但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战争在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已持续了十年的战乱的延续。已经习惯了在战乱中逃亡的百姓，和看惯了总统、总理以及国会不断上台下野变幻的政治家们，大多没有看到这场战争于中国的意义。

舆论环境：渐松渐紧

中国的经济和新闻媒体业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都有很大发展，许多研究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新闻舆论史的著作，将发展的原因归结为政府忙于战乱，其管控能力的薄弱使得民间经济和民营媒体快速发展起来。但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每次战乱，政府操控能力薄弱的时候，国家经济都能长足发展。实际上北洋政府忙于与各派军阀进行军事战争的同时，并不忘记发布各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也没有停止进行政治改革的尝试，而有的改革的确对中国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的代表，今天的舆论将段祺瑞和没落的北洋军阀以及“三一八惨案”联系在一起，对他的看法大多是负面的。但事实上，段祺瑞的为人和执政成绩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段祺瑞14岁时家道中落，16岁时独自怀揣一块银元去威海投亲，

步行数十天行程两千多里。17岁父亲遇害，18岁母亲去世，其后段祺瑞独撑养活三个幼年弟妹的重担。段祺瑞一生甘于清贫，在任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但他大量发行公债，向外国借款用于武力统一中国，为后人诟病。他在政治和军事上偏听偏信，长期信任谋略出众但刚愎自用的徐树铮，属于用人不当。他个人在发迹后，并未有作威作福之态；下野后，也没忘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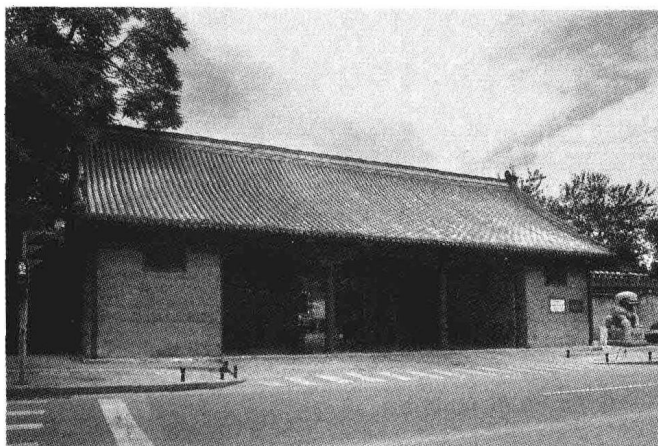


段祺瑞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冀图控制华北地区，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长，使尽办法促其出山，均遭力辞。后段祺瑞应蒋介石之邀，举家从天津迁居上海，其后蒋介石一直“师事之”（蒋曾毕业于段祺瑞创办的保定军校）。

段祺瑞临终遗言有“八勿”，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

虽然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政府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该时期，各行业、各年度的新增厂家数、新增资本数、新增利润数却往往很高，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镀金时代”，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我们在现今的学术著作中常常看到，在政治上遭人痛骂的北洋军阀政府，在经济方面得到的评价往往是“资本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中



段祺瑞執政府大門旧址

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等等。

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小范围实验。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商会，动辄发通电指责政府的举措。工人们不顾饿肚子的威胁罢工以支持学运，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得益于社会对学运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国内环境中爆发并取得胜利的。

另外该时期公民也享有较高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从段祺瑞开始执政的1916年，就恢复孙中山的《临时约法》，当时社会的风气随之一变，袁世凯时期万马齐喑的言论颓废局面随之消失，各种讨论热烈而具体。在这种风气之下，已经停刊的《新青年》再度复刊，开始了其反对“孔教”旧道德的论战，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的标志性杂志。

整个报业在言论上也出现新的发展势头，目前全国通行的关于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高校教材中，均提到该时期报业进步首先是言论风气的恢复。另一个典型就是“四大副刊”的兴起，不仅宣扬民主自由，还有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在当时来说难能可贵。20世纪20年代初，

《晨报》和《时事新报》派出驻外专职记者,是中国记者自己报道世界各国情况的开始,其中就有向苏俄派出的瞿秋白等三人。如此开放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环境,可以窥见当时北洋政府并没有或者没有力量压制和禁锢新闻言论。

在报刊的创办上,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就从此产生了。因此当年创办的刊物比较多,但大部分都属拉来政治关系,只要“轰动一时”即可,并没有长久的打算,或者就直接是某个党派或团体

的机关刊物。该年创办的著名报刊有上海《良友》画报,天津《北洋画报》、《庸报》以及我们要重点说到的《大公报》等十几种寿命不一的报刊。

1926年1月20日,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开会,推举毕蔚真为主席。决议选派报馆通讯社记者十多人为代表,于22日赴执政府国务院,递送呈文,要求废止袁世凯时期制订的《出版法》及现有的新闻营业管理条例。同月,上海日报公会、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等联合致电北洋政府,呼吁废止《出版法》。迫于全国舆论压力,28日,段祺瑞下令取消现行《出版法》。这部《出版法》是袁世凯为钳制新闻出版而订立的,内容包括对报刊创立、缴纳保证金和出版内容的各种限制,以及违规后的处罚等,出台于1914年12月5日,在整个袁世凯时期,成为政府查封报馆、捕杀报人、传讯报纸的“法律依据”。1916年6月袁死后,该法律失去实际效用,但并没有废止。此次废止有保证言论自由的法律意义。



《新青年》杂志

报人之死：邵飘萍、林白水

如此详细地介绍段祺瑞，主要是为了说明其后入京的张作霖和张宗昌却是另一类北洋军阀。被张学良称为“有宏才无大略”的文盲张作霖，与不知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财产和多少小老婆的“杀人如麻”的张宗昌，在1926年4月联合进京后，中国自“癸丑报灾”以来最严厉的杀害报人事件再度发生。



邵飘萍

1926年4月24日，《京报》社长、风流儒雅的邵飘萍因“勾结赤俄，宣传赤化”被逮捕。但张作霖动杀心，最主要的还是憎恨邵飘萍暗中联络冯玉祥和郭松龄（后者曾是张的心腹大将），促成两方联合，使郭松龄在前线关键时刻倒戈反张，一度使张作霖陷入下野出走的绝境。后来郭松龄虽然被平定，但邵飘萍已被张作霖列入必除之而后快的黑名单。当然，此前张作霖也怀“仁心”，希望用三十万的巨款收买邵飘萍，创下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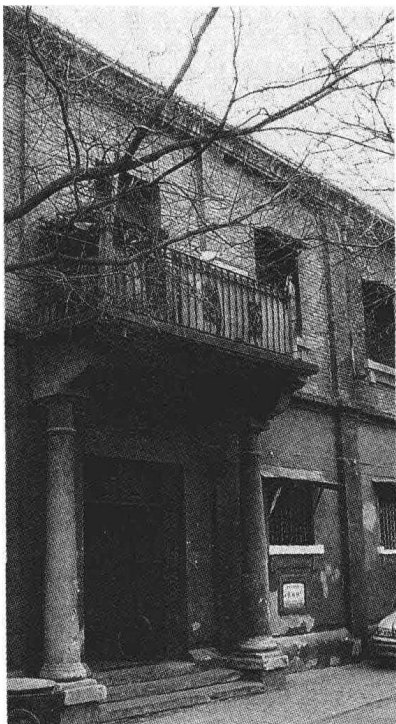
国最贵的言论舆论收买价格，被邵飘萍断然拒绝。邵飘萍被捕后，北京报界曾说情于张学良，希望他能本“尊重舆论”之意释放邵飘萍。但游说未果，被捕两天后，邵飘萍被枪杀。

据当年《申报》所载，当时北京报界同人曾派出十三位代表营救邵飘萍，分别是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和汉口《正义日报》的驻京记者以及《北京晚报》、《五点钟晚报》、《中报》、《公报》、万国电信社、神州通讯社、益智通讯社、民生通讯社、报知新闻社的记者。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也对此事做了报道：

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氏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师与吴子玉（即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释，并恳求张本夙昔尊重舆论之善意，将邵开释，或永远监禁，以保全其生命。张谓余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各代表恳求至三小时之久，张笑谓：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郭倘因他事犯罪，余亦可牺牲一己，与其私逃，但其前次举动，余实无法援助，及出兵讨郭之际，余尚致其一书，谓“尔前谓我战术参差，今度且看如何”，又致郭夫人一书，谓：“彼此后不能复为跳舞之戏矣。”张又谓：“余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云云。”时张氏亟要赴齐燮元之预备会议，不能再谈，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

民国资深老记者陶菊隐先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称：“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关于邵飘萍的死，当时报界报道虽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他死得壮烈从容。4月26日凌晨4时，邵飘萍身着灰色棉袍、黑马褂，被押赴刑场。1926年4月27日《顺天时报》报道说，监刑官命“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声，旋被二兵按于地……”。也有报道说他临刑前微微一笑，总之他含笑逝去，十分壮烈。



《京報》館旧址

早在4月22日，邵飄萍已在《京報》上刊登了《飄萍啟事》：

鄙人至現在止，尚無黨籍（將來不敢預定），既非國民黨，更非共產黨。各方師友，知之甚悉，無待聲明。時至今日，凡有怨仇，動輒以赤化布黨誣陷，認為報復之唯一時機。甚至有捏造團體名義，郵寄傳單，對鄙人橫加攻擊者。究竟此類機關何在？主持何人？會員幾許？恐彼等自思亦將啞然失笑也。但鄙人自省，實有罪焉，今亦不妨布之于社會。鄙人之罪，一不該反對段祺瑞及其黨羽之戀棧無耻；二不該主張法律追究段、賈等之慘殺多數民眾（被屠殺者大多數

為無辜學生，段命令已自承認）；三不該希望取消不平等條約；四不該人云亦云承認國民第一軍紀律之不錯（鄙人從未參與任何一派之機密，所以贊成國民軍者，只在紀律一點，即槍斃亦不否認，故該軍退去以後尚發表一篇歡送之文）；五不該說章士釗自己嫖賭，不配言整頓學風（鄙人若為教育總長亦不配言整頓學風）。有此數罪，私仇公敵，早伺在旁，今即機會到來，則被誣為赤化布黨，豈不宜哉！橫逆之來源，亦可以了然而不待查考矣。承各界友人以傳單見告，特此答陳，借博一粲。

從這最後的啟事中，我們似乎可以更深了解邵飄萍遇害的背景。

8月6日凌晨，另一位民國著名報人林白水被殺。福建人林白水，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政法大學，自戊戌變法以來從事新聞事業。林白

水的文章意到笔随，往往“发端于苍蝇之微，而归结于政局”，“语多感愤而杂以诙谐”，很有影响。

是日子夜，正在《社会日报》社删改稿件的林白水，忽听外面人车鼎沸，原来是宪兵司令王琦派兵来抓他，一共开来了三辆军用卡车，好像抓江洋大盗。宪兵说请林先生到司令部去谈话，结果车子直驶天桥刑场，仅在前门外宪兵分队停了十分钟，是打电话向王琦请示。总计从被捕到行刑，前后不过三小时。行刑前，行刑人员问林有没有遗言，林说：希望自己的子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随后，宪兵宣布林白水犯有通敌罪，当即执行枪决。邓拓曾撰文说，“那时正是夏天，有人见他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蓬蓬，陈尸道旁”。

林白水被害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前一天的《社会日报》上发表《官僚运气》，讽刺潘复拍张宗昌马屁，把潘、张关系比作睾丸与肾脏：

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固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得优缺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表面炎炎赫赫之某肾囊，由总长降为督办，终不可得，结果不免割池子之玩笑，甚矣运气之不能不讲也……

就在林白水遇害的第二天深夜，《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也遭逮捕。他刚看完日报的大样，上床不久，就听人



林白水(左)与林纾(1894年摄)

声鼎沸，若干宪兵蜂拥而入，说：“宪兵司令部王司令（琦）请你谈话。”随即将他押上卡车带走。情形与前一日林白水被捕时一样，报社同人都认为成先生此去凶多吉少，恐怕要遭到邵、林同样的命运。路透社甚至抢先发出电讯：“成氏已被处决。”而成舍我自己也认为，此命休矣。

成舍我敢说敢写，素有新闻界“鬼才”之称。他的报纸坚持正统舆论，讲是非，辩善恶，对于奉军毫不客气地批评，触怒奉方，认为他一定有背景。外界评价他从不接受任何金钱上的补贴，但据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在中国作的秘密调查显示，《世界日报》曾接受贺德霖出资，是国民军第二军的机关报。

成被抓走时，潦草地写下了“孙宝琦”的名字，留下营救自己的唯一线索，成舍我夫人杨女士往孙宝琦府上夤夜泣跪求救。事有凑巧，王琦抓成舍我，事先并没有得到张宗昌“立即执行枪决”的命令，而当晚张宗昌新娶一位姨太太，正寻欢作乐，不便打扰，成舍我的命因此暂时保住了，从而为孙宝琦留下了营救的时间。

多年以后，成思危先生曾亲耳听父亲讲这一段往事，知道了孙宝琦为什么会全力相救。原来，1923年10月，曹锟当选总统，第二年，他拉孙宝琦任国务总理。孙宝琦上任不久，就遭到曹锟周围官僚的攻击，尤以王克敏反对最烈。王克敏是财政总长，北京许多报馆拿了他的津贴，都替他说话，因此舆论界出现了“拥王反孙”一边倒的局面。但北京市民百姓却同情孙宝琦，而王克敏本是“金佛郎案”之罪魁，久为社会所不齿。不拿政府津贴的《世界晚报》（亦为成舍我创办）顺乎民意，对孙宝琦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同时，该报副刊还发表张恨水的打油诗嘲骂王克敏，有些诗还传诵一时。正在四面受敌的孙宝琦自然对主持公道的《晚报》感激涕零。不久，孙宝琦的长子孙景阳来成府致谢，临走掏出一张二百块大洋的支票，但被成舍我谢绝。“我父亲当时说，钱如果我收下了，我以后就不能批评孙先生了，那我还办这张报纸做什么呢！”成思

危先生回忆说：“孙宝琦因为这件事从心里佩服我父亲，认为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能有胆识，实在难得。所以，有这些背景，日后他才全力搭救我父亲。”

《大公报》：归去来兮之重生

虽然有极端的个案出现，但在当时一般报人看来，只要不涉及“赤化”宣传，在报刊上指陈时政，批评当权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因此这段时期新报刊的创办依然很多。

当时人们创办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不下去了。特别是北方，政治的动荡、商业的不完善、经济的不发达都直接影响了报纸的经营。

当时在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五千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此销量大约有一万五千份左右。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重地，比邻首都，接近中央，同时又有租界外国势力的庇护，因此在历史上就常有舆论重镇盘踞。清末维新变法时期著名的《国闻报》、1902年的《大公报》、1915年的《益世报》都是影响巨大的报纸。特别是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在京津很有名气。其创办者英敛之是满族人，天主教徒，主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号

持《大公报》十年，辛亥革命后退出。

民国十五年，即 1926 年 1 月 10 日，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 50 岁，他创办的《大公报》已经历经坎坷而停刊，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停刊的《大公报》，其实正在蛰伏，期待着新命运的到来。

的确，就在英敛之离世后不久，《大公报》和他倡导的“敢言”精神被三个有志报业的人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续写了《大公报》的辉煌，并将它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民国十五年，在这风云际会、五味杂陈的局势中，伴随着新的政治局面的到来，一个新的媒体时代也即将到来。

《大公报》归去来兮！